

# 转型与断裂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孙立平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 转型与断裂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孙立平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激光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与断裂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孙立平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ISBN 7-302-08612-5

I. 转… II. 孙… III. 社会结构-研究-中国-文集 IV. D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3465 号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http://www.tup.com.cn 邮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客户服务:010-62776969

责任编辑:周菁

印刷者:北京鑫霸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者: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发行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140×203 印张:12.625 插页:2 字数:314千字

版次:2004年7月第1版 200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7-302-08612-5/C·14

印数:1~5000

定价:28.00元

---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以及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2770175-3103 或(010)62795704。

# 序言：迈向转型社会学

这本书收录了我 90 年代以来撰写的 13 篇论文(其中的几篇是与朋友合作完成的)。这些论文共同面对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社会转型特别是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更明确地说,这些论文代表了作者本人和学界的一些朋友力图创建一门转型社会学的努力。

创建转型社会学的设想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本信念：如果将中国、苏联、东欧改革前的社会形态视之为共产主义文明的话,对这个文明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

在发表于《中国书评》1995 年第一期的《从工厂透视社会》一文中,我曾经写过这样的几段话：

一种文明,只要在人类历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无论是最终的命运如何,都会对人类的智慧构成严峻的挑战：这种文明是怎样产生的？这种文明从文化到制度是怎样运作的？这些问题会吸引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和学者。

马克思、韦伯、汤因比、布罗代、沃勒斯坦这样的大师,似乎终身都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资本主义文明是怎样产生的？其内涵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

共产主义,无疑是另一种在人类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文明。在其鼎盛的时期,曾经囊括了人类的三分之一的人口。在近些年的改革浪潮中,这种文明的内部,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它在向何

处去？公正地说，对这个相当独特的文明，不仅从文明的层次上反思还很少，就是对其内部的相当精密微妙之处的解析也极为鲜见。

更进一步说，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关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就从社会学来说，奠定现代社会学基础的几位大师关注的几乎都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解释。马克思关注的是资本主义中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其中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韦伯探讨的是资本主义文明形成的精神条件，尤其是与基督教伦理之间的关系；涂尔干所面对的则是，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社会整合的机制是人们在共同经历基础上形成的“机械联系”的话，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的整合机制是什么？他将这种新的整合机制称之为“有机联系”，这种“有机联系”是建立在由劳动分工所形成的互相依赖的基础上的。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样的一些关怀，构成了社会学的基本母题。

而现在，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中国、苏联、东欧改革前所代表的文明形态及其历史性转型，正在开始成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这一点已经不仅仅是愿望或猜想，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成为现实。目前，对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研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在西方学术界，甚至一些原本不是研究中国、苏联和东欧的社会学家也在纷纷转向对这些国家市场和社会转型的研究。而一些刚刚涌现出来的成果，比如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对制度嵌入其中的社会因素的研究以及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正在对原有的理论模式构成挑战。现任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在一次谈话中甚至说，这些研究正在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主流。而伊亚尔（Gil Eyal）和撒列尼（Ivan Szeleynyi）在《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1998）一书中，则试图通过对这些国家转型的研究构建一种“新古典社会学理论”。所有这一切可以启示

我们，我们应当将这些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共产主义实验以及所正在经历的历史性转型，作为一个学术资源的宝库。

将转型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性的概念提出来，至少有这样的两层含义。第一，转型社会学不是社会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而是一种理论视角。记得在 80 年代，也有人提出过想建立“改革学”之类学科的设置。最后是不了了之。原因之一，是其努力具有一种非学科化的特征。有人为这种改革学设想的是包括改革的内涵、改革的阶段、改革的策略等等内容。事实证明，这种努力基本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之一，也许是缺乏学科的背景。而转型社会学，面对的则不是这样操作性的问题。转型社会学意味着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共产主义这种独特文明作逻辑的理解，以对这个逻辑及其变迁的理解为基础对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现象进行研究。也就是说，转型社会学要面对的不是某一类特定的现象，而是将所研究的对象置于社会转型这个基本的背景框架之中，更确切地说，是置于有关这种转型的知识框架之中。第二，转型社会学是一个相对独立进行知识积累的学术领域。如前所述，转型社会学是建立在对于整个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的理解之上，所形成的是有关这个文明及其转型的系统知识。这里有必要强调的一点是，如同资本主义文明一样，这个共产主义文明在日常生活中的运作也是具有一套互相联系的逻辑的。这是将转型社会学看作一个可以相对独立进行知识积累的领域的现实基础。

这里所收集的，实际上只是我们近些年来所做努力的一部分，这些成果更多地是对社会结构框架及其变迁的分析。而近年来我们进行努力的另一部分，则集中体现在本书所选的最后一篇论文即《迈向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中。在 2000 年卷的《清华社会学》评论上，发表了我和我的同事郭于华教授以及我原来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的几位学生的一组论文，总的题目是《中国农村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这组文章的意

义在于,力图将当代中国农村中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结构来理解,而且是作为一种实践形态来理解,同时,在这组论文中提出了“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方法,以期更好地来面对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更好地来面对共产主义文明在普通人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运作逻辑。我们相信,对共产主义文明在普通人日常生活实践中运作逻辑的理解,将成为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在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在这些论文即将结集出版的时候,我要对那些经常在一起讨论的朋友们表示感谢,特别是现在已经成为我同事的沈原博士和郭于华博士,其中的一些观点就是在与他们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中形成的。

孙立平

2004年6月于清华园

# 目 录

序言：迈向转型社会学 ..... (1)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 (1)

中国国家与社会 1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4 行政性整合与契约性整合 9 组织与单位制 12 身份类别划分与社会流动 16 区域格局与区域关系 21

社会结构转型：中近期的趋势与问题 ..... (26)

导言 26 前提与背景 28 社会力量的重组：中产阶级还是两极社会？ 34 社会碎片化与社会自组织的发育 51 市场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和可能的危机 59 社会重建：结构、制度、组织 72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 ..... (77)

一个新的社会的出现 80 形塑90年代中期以来新社会的三个基本背景 89 资源积聚背景下的两极社会的形成 97 社会结构的断裂：阶层与城乡关系 109 社会生活“西西里化”与新的秩序 119 断裂社会中的社会抗拒和社会动荡 125 断裂社会中的政府与秩序 132

改革以来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 ..... (137)

改革前强国家—弱社会模式的形成 137 改革过程中中国国家与社会间的结构分化 144 国家与社会新的结合 154



进一步的讨论与结论 165

## 改革前后中国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及

民众间互动关系的演变 ..... (172)

**“单位制”及其变迁** ..... (217)

“单位制”的再探讨 217 “单位制”与社会结构 222 改革以来“单位制”的演变 231 简短的结论 241

**“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 ..... (246)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 246 资源配置与新的社会关系 249 原子化与庇护关系 253 社会关系类型的讨论 259 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 266

**9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的几个新特征** ..... (271)

贫富差距扩大的程度加大,而且继续恶化 271 贫富差距的扩大出现失控的趋势 273 贫富悬殊开始固化为社会结构 278 社会对贫富差距的认知在变化 281

**总体性资本与转型期精英形成** ..... (284)

总体性精英的形成过程 284 精英形成:讨论的理论背景 286 总体性精英与不分化的资本 289 进一步的讨论 293

**社会转型与农民工流动** ..... (297)

农民工:起源的独特性 299 流动过程:有序与无序之间 306 对外来流动劳动力退路的评估 314 “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 318 “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下的民工潮 322

耐用消费品时代与“新二元结构” 327      断裂的社会与农民  
工流动 330

**内需不足的社会学分析** ..... (335)

滞后的城市化:使农村人口被甩在市场之外 335      制度不确  
定性:导致畸形的储蓄倾向 339      收入结构:决定了常规性  
支付不足 343

**机制与逻辑:关于中国社会稳定的研究** ..... (347)

社会动荡的类型 347      可能的模式与逻辑 349      导致社  
会动荡的深层因素 352      社会抗拒更多地将会以社会治安  
的形式发生 358      寻找制度化地解决社会抗拒问题的新方  
式 362

**迈向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 ..... (365)

社会科学的“黑色星期五”与新的理论探求 365      政体的断  
裂与延续:不同背景下的市场转型 370      面向社会转变的实  
践过程 380      “日常生活”的视角与对底层社会的关注 385  
实践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387      简短的结论 390

#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15 年来的改革开放已经引起中国社会一系列重要变迁。将这一变迁视为总体性的结构转型或结构变迁过程,是社会学独具特色的研究角度。本文在对国内外大量文献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这一总体性结构变迁过程作出准确的描述和概括性分析。

## 一、中国国家<sup>①</sup>与社会

在改革之前我国的总体性社会结构中,国家几乎垄断着全部重要资源。这种资源不仅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其中最重要的是就业机会)及信息资源。以这种垄断为基础,国家对几乎全部的社会生活实行着严格而全面的控制。同时,对任何相对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力量,要么予以抑制,要么使之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可以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一个相对独立的、带有一定程度自治性的社会已不复存在。

这意味着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根本性重组,其最直接的目的

---

\* 本文的作者为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杨善华、林彬,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4 年第 2 期。

① 这里的国家特指国家机构。

的是增强国家的能力,从而有助于解决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两个最急迫的问题,即:结束自清中期以后逐步形成的、最后以军阀混战形式表现出来的总体性危机;在总体性危机基本结束之后,加速进行工业化,以富国强兵。应当说,强国家、弱社会模式的建立,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模式之中,政治解体和社会解组迅速地结束,社会恢复了稳定与秩序。在国家的有效动员和组织之下,工业化迅速推进。1956年,中国的工业产值第一次超过了农业产值。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随着工业化超过简单资本动员阶段以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不断深入,这种体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即从有力的推动逐步变为不适应,最后,两者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矛盾焦点集中地表现为动力与秩序的无法兼容。在此期间,虽然也在中央和地方以及条块之间多次进行权力关系的调整,但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

在改革开放15年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再一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虽然很难说从改革一开始人们就已明确地将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为改革的目标之一,但许多具体的改革措施实际上导致了国家与社会间的结构分化。这种变化首先始于改革初期对“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以及为重建党和政府的权威基础而进行的一系列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党和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具体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第一,控制范围的缩小。这明显地表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在此期间,虽然也发生过或小或大的反复,但总的说来,在这些领域中,党和政府的直接控制和干预已经越来越少,自主性在明显增强。生活方式的变换则更多地与市场或自发的时尚相联系,而不是由于党和政府的推动。在科学研究领域,真正的禁区已极为有限。第二,在仍然保持控制的领域中,控制的力度在减弱,控制的方式在变化。即由一种比较“实在的”对实际过程的控制,转变为一种比较“虚的”原则性控制。第三,控制手段的规

范化在加强。改革之前,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控制具有相当任意的特点,“文革”则将这种任意性推到了极端。在当时的情况下,控制的范围可以延伸到任一领域、任一角落;为了达到控制的目的,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改革以来,由于法制建设的加强以及政府行为逐步走向规范化,这种任意的控制开始向一种较有规则的控制转变。

上述变化造成了自由空间的出现和不断扩大,这种自由空间的形成是导致国家与社会间结构分化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而以产权的多元化和经济运作市场化为基本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则直接促进了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的形成。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如前所述,改革前国家是社会中所有重要资源和机会的垄断者,个人生存所必需的基本条件,都必须从国家那里得到。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对国家不能不有一种极强的依赖性。反过来看,这对国家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经过十几年的改革,社会已逐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与国家相并列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这些资源和机会的提供与交换,主要是通过市场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对国家的依附性明显降低。

第二,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形成。据最新数字,现在中国个人的储蓄、债券股票及手持现金,已达 18000 亿元,相当于国有的资产的一倍半。1989 年底,中国城镇的个体劳动者为 648 万人,如果加上农村的个体农民以及其他非公有制企业中的从业人员,这个数量是十分庞大的。从拥有的经济力量来看,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已有相当发展。据国家信息中心的预测,到 2000 年,中国所有制产值结构将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即在工业总产值中,全民工业产值的比重将下降到 27.2%,集体工业的产值将上升到 47.7%,城乡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比重将分别达到 13.4% 和 11.7%。在此前提下,较为独立的企业

家阶层、个体户阶层以及知识阶层,都有了明显的发展。在社区的层次上,这部分人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参与在明显增加。

第三,民间社会组织化程度的增强。在改革前的国家极强、社会极弱的总体性社会体制下,既然没有相对独立自主的社会,当然也就谈不到民间社会的组织化,在十几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社会力量的发育与生长,组织化的需求已经出现。这种需求的实质在于,用民间社会自己的力量来协调自己的行为。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这样的民间组织(在社会学中称为中间组织,即介乎于国家与家庭之间)主要包括:行业协会、商会、文化体育协会、学术性的学会或协会、基金会、联谊会以及各种名目的俱乐部等。组织化是实现民间社会活动有序化的重要保障之一,也是在基层社会生活中具备自我形成秩序的能力的不可缺少的形式。在市场化改革推进速度较快的地区,商会等中间组织已开始在经济活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以上方面可以看出,由于社会中自由流动资源的出现,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正在形成。虽然这个过程还刚刚开始,但随着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与社会间的结构分化将会更加深化。这种变化正在并将继续对整个社会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 二、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改革以来,中国的社会变迁意义最重大、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结构的剧烈、持续、深刻的分化。结构分化是指在发展过程中结构要素产生新的差异的过程,它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社会异质性增加,即结构要素(如位置、群体、阶层、组织)的类别增多,另一种是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即结构要素之间差距的拉大。

结构分化作为社会变迁的主要形式之一,其对现代化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机制,即由异质性所体现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

组织对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以及角色多元化和职业等级差异对阶层多元化、社会流动和教育普及的引发及促进作用,这两者都有助于消除封建的“先赋”特权,增加个人“自致”地位的比重。因此,许多社会学家将社会结构的分化程度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将结构分化的形态作为观察和描述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的来说,改革前中国社会是一个分化程度较低、分化速度缓慢、具较强同质性的社会,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社会的政治中心、意识形态中心、经济中心重合为一,国家与社会合为一体以及资源和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国家具有很强的动员与组织能力,但结构较为僵硬、凝滞。这种结构形态可称为“总体性社会”。

第二,社会的组织类型和组织方式简单划一,都是按相同的模式建构和按统一的方式运行,所有的社会组织,不管是行政的、事业的或经济的、政治的,均由政府控制和管理,均有一定的行政隶属关系和行政级别,并依此从政府那里获得按计划分配的资源。同一类、同一级组织在内部结构、社会地位以及行为方式上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类别、不同等级的组织之间虽然在资源获取多少、权力大小、专业职能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在行为方式和制度框架上没有什么显著的不同。在与国家的关系上,所有社会组织都缺乏独立利益和自主权。

整个国家和社会资源高度集中的结果,使得每一组织除从国家获取所需资源外,没有任何获取资源的渠道。另外,除了国家统一调拨、统一分配外,组织之间缺乏横向联系,要素和资源很难横向流动,这就使各类组织一方面高度依赖于国家,另一方面由于条块体制的分割而成为某种“自足”的、功能齐全的“单位”。

第三,改革前中国社会结构的明显分化是城乡两大社会群体和城市内部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体间的划分。这种分化

不仅是职业和阶层的差异,更是一种身份等级的差异,其最主要的特征是身份等级间界限分明、进出规则清晰。一旦具有某种身份就很难改变。与身份之间较强异质性和不平等相反,身份内各社会成员间具有很高的同质性和平等性。因此,社会成员间有限的分化不是所谓的“自致性”分化,而带有很强的“先赋性”色彩。对个人位置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职业、地域、所属组织或群体,而主要是身份。个人位置在各方面是高度整合的,即身份的差异与收入、声望、权力上的差异同构。

上述特征是1949年以来一系列改造过程的结果,这种改造的实质可以用抑制分化来概括,即除国家规定的身份和等级(包括行政、工资、待遇、权力)的差异外,人为地限制个人位置的分化,以及限制各种社会要素(如经济成分、政治组织、文化、思想)的分化。这种限制和改造是通过大规模政治运动(如农业集体化、工商业改造、“反右”运动等等)和各种制度、政策(如统购统销政策、户籍制、劳动工资制度)来实现的。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最根本的变化是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这一变化的根本动因是体制改革。改革对我国社会分化的影响大致是这样一个过程:(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国有企业的“分权让利”使社会产生了自由流动资源,即不受国家统一控制和分配的劳动力、资金、产品、原材料、技术等。这些资源随改革的深入而不断增加。(2)自由流动资源的出现与增加导致整个社会资源的组织与分配方式的变革,即由单纯地依靠计划体制和行政手段转变为计划与市场、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3)多种利益主体和权力主体的发育,如各种地方和社区政府、政府各部门、民间组织、农村各类企业、城乡个体工商户,等等。(4)功能专一的组织和角色群体的出现与增加逐渐导致了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经济与行政、行政与法律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初步分离。改革以来,这一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的结构变迁过程作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表明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中最值得关注之处是：

第一，体制改革始于农村，其对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最大贡献是推动了农村工业化的迅速兴起和蓬勃发展，这一农村工业化进程导致农村原同质均等的社会结构发生剧烈的分化，新的角色群体和组织大量涌现，如乡镇企业家、近一亿的乡镇企业工人和新的合作企业、私营企业等等。

城乡原社会结构的二元特征决定了城市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不同于农村，城市社会分化主要是体制内外的分化。改革后城市社会分化首先发生在原体制的最边缘部分，其结果之一是一部分处于体制边缘的社会力量率先从体制内分化出来，如个体工商业者、民营企业、三资企业等。随着分化从体制边缘向体制中心部分的不断推进，体制外力量亦不断增强，他们以不同于体制内的规则和方式组织与运行，这一过程一方面不断地受到体制内社会分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受到农村社会分化的影响。一些横跨两个体制和城乡两大社会系统的交叉性群体和边缘性群体开始出现，如个体户、进城做工的农民工等等。上述各种新的结构要素的出现和增加，有力地推动了民间社会的发育。

第二，改革后随着各类社会主体（个人、组织、政府）自主权的扩大和利益的明确化，原由行政级别和身份等级决定的等级式社会分化逐渐转变成一种由类属和单位边界决定的团块式分化，决定社会成员地位与利益差异的原等级要素，如所有制类型、家庭阶级出身、政治身份、行政级别等的作用大大削弱，而个人所在单位和社区的发展状况，个人所属职业类别和部门（如汽车司机、税务部门）等集团性要素的作用增加。社会结构从等级性分化到团块式分化的转变意味着中国社会的阶层化过程将是缓慢的。

第三，与改革前相比，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分化速度大大加